

历史巨作
博大精深

中国通史

图鉴版

中国档案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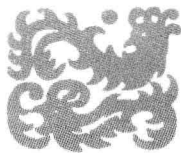
中国通史

(图鉴版)

第六卷

主编 隆 炜
副主编 陈龙娟 张延玲 高磊

中国档案出版社



第五节 戊戌变法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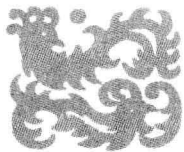
1.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

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投资设厂有利可图，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的重要条件。中法、中日两次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严重加深，刺激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民族工业、采行“西法”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手段。同时在帝国主义对华大量输出资本的形势下，要求准许民间设厂的呼声日益强烈。1895年6月，顺天府尹胡燏棻在《变法自强疏》里说：“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其后几次《上皇帝书》里，都提出奖励、保护民间兴办企业的要求。此外，清政府面对外国资本大量倾入的压力，也不能不考虑对民族资本作一定的让步。1895年6月5日，清政府以“电旨”方式“飭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这项被迫而采取的新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根据不完全统计，1895—1900年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多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家数略等于甲午战前二十多年的总和，从资本总计来看，则超过了甲午战前的累计。其中1896年—1898年3年间投资家数较多，似乎出现了一个兴办企业的小小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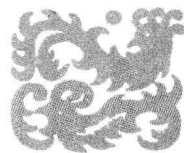
1895年，在上海设立的私营企业有：裕晋纱厂、大纯纱厂；1895—1896年在上海出现信昌、祥兴、永泰等缫丝厂；在广东顺德陆续出现11个丝厂。1896年宁波有通久源纱厂（由李鸿章幕僚严信厚创办，主要投资者



为上海、宁波两地绅商), 1897 年无锡有业勤纱厂(由杨氏兄弟——杨宗濂、杨宗瀚创办, 内有江苏省积谷公款 10 万两)、苏州有苏纶纱厂、杭州有通益公纱厂、汉口有燮昌火柴厂、上海有商务印书馆。1898 年上海有源昌碾米厂、上海自来火厂; 天津有北洋硝皮厂。此外, 1896 年广州机粉厂、1897 年芜湖益新面粉厂、1898 年广东北海煤矿、1899 年南通大生纱厂等也投入生产。大生纱厂创办人张謇, 42 岁考取状元后, 转向实业。大生纱厂压价收棉, 抬价销纱, 又用压低工资等办法剥削来自四乡的工人, 发家很快。二十世纪初年, 张謇为了使大生企业自成系统, 互为支持, 他陆续办起崇明久隆镇大生二厂, 以及其他南通广生油厂、南通复新面粉厂、通海垦牧公司、南通资生铁冶厂、大达轮埠公司、南通大隆蜡皂厂等 18 个厂、栈、公司。二十世纪初年, 大生企业在“沪上纺纱各厂无不亏本”的情形下, 每年可赚净利 30、40 万两左右。

这一时期, 各地兴办工业的情况, 张之洞 1897 年 4 月的奏折有所反映: “数年以来, 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 30 家。此外机造之货, 苏沪江宁等处, 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火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缫丝之请, 陕西现已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 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 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矿, 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 十年前即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 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更可类推。湖南、湖北两省, 已均有购机造火柴及榨油者, 湖北现已学得机器造塞门德士之法, 正在督饬税务司劝谕华商兴办。湖南诸绅, 现已设立宝善公司, 集有多股, 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工货之法, 规模颇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 而它的主流是纺织业。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附近, 资力薄弱, 规模不大, 受帝国主义种种压迫和封建势力严重束缚, 发展极为困难。进口的洋货照缴 7.5% 的正税和子口税, 就可以到处畅行无阻, 而国货则要逢关纳税, 过卡抽厘。不少企业开办不久, “有歇业者, 有推押与洋商者,” 无法摆脱倒闭的命运!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展起来了。由官僚、地主、富商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由普通商人及手工业场主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时发展较快, 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 社会影响也大, 其两面性特点比较显著。但在中国处于被瓜分危机的情况下, 他们也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很大压力。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政治上要求掌握一定的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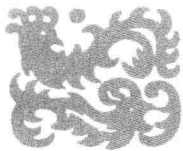
力，因此迫切希望进行一些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改革。

甲午战争后，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受瓜分危机的刺激，要求变法图强，挽救国家危亡的呼声很高。他们在实际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这个政治派别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愿望。他们企图在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实行有利于国家独立富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的变法维新活动被称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2.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局限性

从商品市场的状况来看，容易使人了解这时民族工业发展的局限性。以棉纱为例：1894～1898年长江中上游7个口岸（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洋纱输入量每年平均21万担，而国产纱每年平均3万余担，占输入净量的13.6%。同一时期，华北4个口岸（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洋纱输入量每年平均31万多担，而国产纱每年平均为2万担，只占输入净量的6.3%。这个统计虽不十分准确，但它可以说明华中华北两个市场洋纱占据绝对优势，国产纱的销量较小。

中国民族工业初步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民族工业还只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较有力量的是刚从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比起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上升的资产阶级中下层带有更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维新派就是这部分人在政治上的代表。他们企图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改革，通过君主立宪的道路，刷新内政，抵制外侮，把古老中国逐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二十世纪初年，原来普通工商业者力量壮大起来，形成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淡薄，挽救民族危亡和要求推翻清政府的主张比较迫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为理想目标。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区分，构成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维新和革命两个派别的分野。十九世纪末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比起形成过程中的中下层较有力量，戊戌维新是它在政治上能动作用的明显反映。



二、早期的维新思想

1. 马建忠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19世纪70年代，在一些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一种思想动向。这种思想带有资产阶级维新的性质。到80年代，这种思想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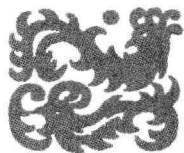
这种维新思想是在外国侵略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70年代，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多半与洋务派官僚有联系，但是他们认为洋务活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王韬（著有《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著有《筹洋刍议》）、马建忠（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是这个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他们看到洋务派搞的洋务活动不能挽救清朝统治，也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对洋务活动进行批评，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的思想变化以马建忠最典型。

马建忠（1845—1900年）江苏丹徒县人，“初学举业，后改习洋务”，在上海学会英文和法文，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充翻译，后来入法国巴黎大学读书，学习勤奋，考得文科、理科、法律、政治、外文各科学位，回国后清廷授予道员虚衔，入李鸿章幕府充幕僚，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

马建忠在巴黎学习期间，基于他对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深感洋务活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认为必须改弦更张。1877年，马建忠写信给李鸿章说：“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马建忠不敢对洋务活动明目张胆的批评，只是以汇报思想变化的形式曲折地谈了自己对洋务活动的看法。富强之本在于“护商会”、“得民心”，单讲洋枪、洋炮、新式军队，是本末倒置。这种思想反映了他与洋务派产生了根本分歧。

马建忠还指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查中外交涉以来，西人两次构衅，藉势凭陵，乘我仓猝之时，要我立约，篇帙数十页，条议数十款，无非藉此取益。故领事则优如公使，税则则轻于各国。”更进一步指出



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税则影响国内民族工商业发展，“当时（1860年）英、法与中国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各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数十年吸中国之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他针对当时英、法、德国要求清朝督抚对领事行文不得用札文及洋货入“内地科征”（即免内地厘金），提出领事至华得清朝皇帝“批准方可任事”，则督抚行文改用“照会”，领事对督抚仍用“申陈”，而“更定中国增税之章，以与厘金相抵”的对策，并建议清廷“乘其欲免厘金，许我加税之机，仿照各国通商章程，择其可加者加之，以与厘捐相抵，然后将厘卡尽行裁撤，省国家之经费，裕我库储，便商贾之往来，苏其隐困”。加关税，撤厘卡，“便商贾之往来”，反映了发生时期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

1890年马建忠写出《富民说》，标志着他的维新思想正式进入形成时期。他在《富民说》中进一步批评了洋务派的洋务活动，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维新思想，及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他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则工役之散不出中国，宝藏之聚无待外求，而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自无不足矣！”他在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说，如何使中国货出口多呢？“则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也。”主张奖励发展丝茶生产，并采取轻税政策；如何使外国货进口少呢？“则在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也。”主张发展机器织布局。他批评李鸿章于1879年筹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今则重为整顿，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祇五六百匹，岁得18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又况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重而本有所亏，多织则费减而利可稳获。拟请将原设织局扩充资本，或再立新局，务使每年所织之布匹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策。……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如何能使财常聚而不虞其散呢？“则在开矿山自有之财也。”主张发展矿冶业，开采煤铁金银各矿。为了使中国富强，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建议清廷略仿西方各国设立商务衙门统筹工商业，“若金矿，若织布，若丝茶，先易后难，次第分办。其办理之法，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最后，他说：“如是数年之间，即可转贫民



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富民说》无疑是反映了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

马建忠的维新思想仅仅谈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未涉及政治改革。另外他虽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并不坚决，“即所议不洽，亦不过仍守旧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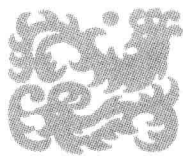
1894年后马建忠离开北洋，回上海从事著述工作。他参照英、法文文法，用周、秦以后至唐代韩愈以前的诸家文字为例，分析词类，编辑了一本汉文文法——《马氏文通》，是为汉文文法第一本著作，于1898年出版。

2. 郑观应等主张君主立宪

中法战争以后，洋务活动初步破产，人们对洋务活动产生怀疑，要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具有这种维新思想的人增多了，这些人不少是中小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还有投资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批评洋务活动，不满意清政府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并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

这个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有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陈虬（著有《救时要议》、《经世博议》）、陈炽（著有《庸书》）、何启、胡礼垣（合著《新政真诠》），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叙述，这里仅介绍比较完整的郑观应思想，以见一斑。

郑观应（1842—1921年），广东香山县人，“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学，隐于商。”任过英人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来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载行，还协助过李鸿章办理轮船招商局事务，所以他对西方政教和洋务活动得失有自己的看法。郑观应“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随后他又引用张树声对洋务活动的批评，进一步表达自己对洋务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见解。“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铁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批评洋务派对西



方学习“遗其体而求其用”，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

郑观应还进一步谈到实行议院政治的必要性，“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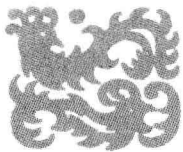
郑观应批评美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院，“或民权过重”，“或不免有叫嚣之风”，而“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他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他热衷于英德两国那样的君主立宪政治，想在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上，来谋求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企图不经过革命流血的斗争，使绅商们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主张却不自觉的反映资产阶级要求有限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在融解封建专制主义的冰层这一点上自有它的进步意义。但是，君主立宪政体主张，还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

在经济上，郑观应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的主张，建议清廷设立商部，南北洋分设商务局，各地设立商会，习商战，奖励出口，实行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政策；他后来反对“官督商办”，“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要求清廷准许民间或自办，或集股兴办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等企业；他还建议清廷派人出国考察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等，回国后改进农副业生产。这些无疑是有利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

在外交上，郑观应主张依照国际公法，将中国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规定进行修改，或废除，以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使中国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发展的目的。

在文化教育上，郑观应认为八股试贴不切时用，使人“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希望代之以格致科学。他建议清廷实行武科、文科并举，另立一科专试西学；于州县设立小学，省会设立中学，京师设立大学，翻译西方各国有用书籍，“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这些主张有利于培养人才，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郑观应的维新思想较马建忠维新思想完整、系统化，特别是有关议院政治问题，马建忠看到西方议院政治优于君主专制制度，但他缺乏实行议院政治的强烈要求；而郑观应基于本身阶级立场，对西方各国议院政治有区别比较，认为英、德君主立宪政体较好，故希望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一变化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力量对比有关系。中法战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政权的要求。虽然洋务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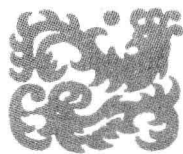
开始破产，但封建统治阶级中又分化出来一批人继续搞洋务运动。而在这时张树声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向西方学习的建议。郑观应提出“君民共主”问题，比他明确得多。

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中仍然含有对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的依赖和幻想成分。如发展商务和进行商战依靠官权的护持。又如对帝国主义认识不足，幻想得到某些帝国主义支持。

3.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流传着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时逐渐形成了一股改良主义思潮。当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洋务运动的弊病，感到封建政权的腐朽，因而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借取了进化论等思想武器，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也严厉批判了只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皮毛而反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大力宣传只有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吸引了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顽固派和洋务派反对革新、卖国投降的反动嘴脸，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向封建制度展开了进攻，并在1898年发展成为有理论、有纲领的救亡爱国的政治运动。因为1898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所以又称之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康有为就是这次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三世之为士”的没落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青年时代去过北京、上海等地，浏览外国书报的译本。他从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触了不少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中法战争的失败，更给他以强烈刺激，由对传统的封建学术、思想发生怀疑，苦闷彷徨，逐渐转到“讲求西学”和要求改革现状方面来。1888年，他参加顺天府乡试，没有录取。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大声疾呼：“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他详细陈述了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如果继续因循守旧，不但沙俄等列强会步步进逼，而且象太平天国那样的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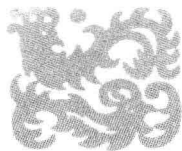
命将会再次爆发，要求皇帝赶紧“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这次上书虽然还没有涉及到变法的具体方案，但对变法前途却充满了信心。他强调中国如果真能变法维新，十年之内“富强可致”，三十年即可“雪耻”。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

这封上皇帝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递上去，但却在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人士中辗转传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这次上书渐渐有了名气。他于1891年回到广东，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学馆，招收学生讲学，培养维新骨干。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人，就在这时候拜康有为为师，后来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同时，先后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在这部著作里，康有为把西汉以来历代皇帝奉为经典的古文经书《周礼》、《诗经》、《书经》、《左传》等，统统宣布为“伪经”，说这些书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建立新朝而伪造的，不是孔子的真经。康有为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曾被统治阶级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抨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守旧思想。康有为的言行引起顽固派的痛恨。他们攻击《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使学者几乎无可读之书。该书于1894年被给事中余联沅参劾毁版。康有为又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着重宣传了他的托古改制的思想。他说孔子的《六经》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把自己的主张假托古圣王的言论写出来的。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帜，力图表明自己所提出的变法维新主张是合乎先王之道的。但“托古改制”说同样触犯了封建势力。顽固派攻击康有为表面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主义，咒骂他“灭圣经”、“乱成宪”，要求毁他的书，杀他的头。

康有为这时还写了《人类公理》，就是后来《大同书》的初稿。这部书在戊戌变法时期并没有公开发表，但辗转传抄，影响同样很大。康有为在这部书里，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康有为只是幻想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调和阶级矛盾，让各阶级不经过革命流血而携手走向“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问世，对当时思想界震动很大。梁启超曾说：如果把《新学伪经考》比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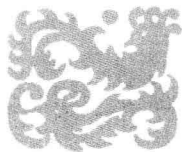
《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喷火”。康有为就是通过这两部书，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的学说作武器，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守旧势力，奠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成为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从此，康有为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比较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中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变法维新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也迅速展开。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联合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请愿。汉朝时用地方举孝廉的办法征用士人，凡被举孝，政府用公车接送入京，后人用“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得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义愤填膺。康有为发动广东、湖南举人签名，于3月28日呈上一封《上皇帝书》，表示坚决反对签约。接着18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决定联名上书皇帝，推康有为代起草。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万余言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六百多名在万言书上签名通过。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悲愤的心情，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前三项为“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而变通旧法，才是“自强之策”，于是提出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主张。又建议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举出“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询”、“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可继续任用。总之，上书的内容既包括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也包括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这次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未达光绪皇帝手中，但其全文已辗转传诵，风行一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为此刊印《公车上书记》，广事宣传。各省举人回到本省，也多少传播了这种言论，从而扩大了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要求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运动

1. 康有为组织强学会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就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这对于他的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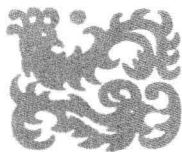


治活动更加有利。同年5月和6月，他又连续两次上书，作为“公车上书”的补充。其中除删去拒和、迁都的建议并反复强调必须赶紧变法的道理外，还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从正面论证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这是维新派向封建统治阶级明确提出分享政权的首次尝试。他为了避免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特别是为了消除光绪的顾虑，曾一再解释召开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他说：“会议之上，仍取上载，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这样，就把议院变成了咨询机关，再一次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软弱。第三封上书递到了光绪手里。光绪读后，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因此非常重视，命令誊抄四份，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这是维新派取得光绪支持的开始。

光绪对变法主张的重视，给维新派带来了很大希望。然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重重，充满矛盾。光绪和他的亲信官僚并不掌握清政府的实权，而把持中央和地方实权的慈禧集团，是一批对外投降、对内反对革新，极力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光绪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傀儡地位，企图利用某些改革，从慈禧集团手中夺取统治大权。尽管光绪他们对维新派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对“民权”思想尤为反感，但为夺取政治权力，光绪的师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不惜降低身份，去访问小小的工部主事康有为，使康受宠若惊。此后，康、翁接触频繁。维新派开始把光绪的亲信引为靠山，进一步加深了依靠皇帝和王公大臣实现变法维新的幻想，说什么“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参加变法维新运动，康有为等人在上书皇帝和联络王公大臣的同时，还以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为中心，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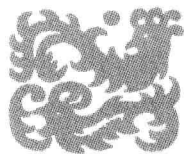
在北京，康有为于1895年7月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中外纪闻》开始每期印一千份，随当时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附送给北京的官员们看，不收报费。后来印数每期增至三千份，一时在朝廷内外很有影响。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奔走和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推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陈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吏，当时任户部主事，甲午战前就写过宣传变法维新的著作，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



每次都有人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还亲自写了《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危急犹如“寝于火薪之上”，“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

在维新声势初步高涨的时刻，一些反动的军阀官僚也混进强学会进行投机。例如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参加了强学会，洋务派大官僚、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捐款给强学会作经费，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只因名声太臭而被拒绝。英、美等帝国主义分子也想乘机捞一把，他们打着赞助中国变法维新的幌子，极力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施加影响。早在1887年，他们就在上海成立文化侵略机构“广学会”，它一方面宣传宗教，一方面宣传“变法”，并迎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新知识的迫切愿望，有选择地介绍一些西方书籍，力图从思想上影响改良派。甲午战争后，披着宗教外衣的英、美侵略分子李提摩太、李佳白、毕德格、林乐知等人纷纷赶到北京打入强学会，甚至英国当时驻华公使欧格纳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表面看来，他们对中国的变法运动很热心，李提摩太还在这时向光绪提出了名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但实际上，他们是要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维新派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参与政权，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却倡导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秩序的某些改革，阴谋把中国推入殖民地的陷阱。维新派反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要求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却公开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辩护，反对中国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说什么：“中国立南北直省，环拱京师，外而督抚将军，内而阁部大臣，俱有专司，以上承天子，意美法良，诚不必如泰西君民共主，政多纷更也。”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参与政权，而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却阴谋通过“赞助”变法控制中国。李提摩太在《新政策》最后《目前应办之事》项下，列举九项，其中八项都提出要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企图囊括中国国家主权。他还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内设总管八人，其中四人要由臭名昭著的赫德、艾迪斯、科士达、德鲁等侵略分子担任。这无疑是要在中国建立它们的殖民统治。李提摩太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却助长了维新派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竟然把这批伪装支持变法的侵略分子“视为同志”，来往密切，还希望同他们合作，共同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

维新派在北京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无耻迫害。强学会成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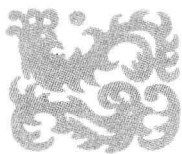


久，慈禧反动集团就暗中破坏，散布流言，准备反扑。同年11月，康有为迫于形势，留梁启超在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并于1896年1月出版《强学报》，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团结组织起来。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虽然其中混进了一些标榜维新的反动人物，但主要力量仍是维新派。变法维新的声势愈来愈大，顽固派再也按捺不住了，李鸿章指使其亲家、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这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见风转舵，跟着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不久，李鸿章又授意杨崇伊弹劾强学会发起人文廷式“互相标榜，议论时政”，文廷式亦被革职。从此，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强学会被迫解散以后，维新派没有气馁，仍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经过翁同龢的活动，在北京强学会的旧址设立官书局，每月经费一千两，任务是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维新派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来上海担任主编。1896年8月，《时务报》开始发行。

2. 梁启超主办《时务报》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变法维新运动中著名的政论家和宣传鼓动家。他在主编《时务报》期间，以通俗、流畅、新颖而又犀利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一系列鼓吹变法的论文，较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受到当时知识界的热烈欢迎。特别是他宣传的“民权论”，对当时影响很大。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民权学说，明确指出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有力地驳斥了“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儒家信条。他把历代专制帝王斥之为“民贼”，断定“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强调这是变法维新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医治中国贫弱的灵丹妙药。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淳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期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梁启超这种对封建专制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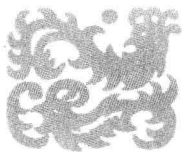
度的大胆抨击，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歌颂和向往，对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感染力。《时务报》成为当时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几个月之间销数增加到一万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及附近地区出版报刊数十种，维新思想大为活跃。

当北京、上海的变法维新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也迅速行动起来，并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这是和谭嗣同等人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3. 谭嗣同创立南学会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和钻研王夫之的著作。青年时代游历南北各省，远到甘肃、新疆等地，目睹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促使他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梁启超说他“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谭嗣同胸襟开扩，对新事物感觉敏锐，阅读过一些翻译的有关自然科学书籍，有助于他批判“俗学陋儒”。1895年，他在湖南听到北京强学会活动的消息，决心投奔京师。

1896年春，他到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知名人士，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变法救亡的斗争中去。谭嗣同写了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和演讲稿，并于1897年1月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就在这本书中，谭嗣同对封建制度作了比较深刻的批判，提出“冲决”纲常名教的封建“网罗”，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一个。他不顾“非圣无法”的压力，大胆揭露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的虚伪性，愤慨地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不仅如此，谭嗣同还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对“三纲”中的“君为臣纲”，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在这里，谭嗣同不但一般地批判二千年来封建专制，而且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今兹”的清朝反动统治阶级。他认为：清朝的统治不仅如“黑暗地狱”，罪恶重于前朝，而且坐视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不思变革，顽固地维护旧制度，实在是“滋人愤懑”，无法容忍。谭嗣同这些“冲决网罗”的激烈言论，特



别是他敢于批判清朝反动统治者的鲜明态度，正是他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激进的地方。

谭嗣同在揭露清朝反动统治者恣意屠杀人民和出卖国家领土的种种罪行的同时，还对广大人民不堪压迫奋起反抗，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他评论太平天国革命时说，“洪、杨之徒，若干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对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及其反动湘军，表示痛恨。他大声疾呼：“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些大胆的言论，是当时其他改良主义者所不敢言的。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藩篱。他激烈地抨击封建的纲常伦理，但却不敢正面批判它的炮制者孔丘。他尖锐地谴责了清政府的暴虐罪行，却又为光绪而效忠。他对人民在重重“网罗”下的悲惨地位表示过同情，呼吁志士仁人起来改造社会，但又强调必须以“供圣人之驱除”。这些都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使象谭嗣同那样的激进分子，也是不可能同旧制度、旧思想真正决裂的。

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变法的实权派。在他周围的一些官吏，如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及后任徐仁铸也都赞同变法。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以及皮锡瑞等人这时也到处奔走，鼓吹变法。在他们的推动下，湖南的变法运动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1897年3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进行宣传鼓动。同年10月，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等人为分教习，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第二年春，谭嗣同、唐才常又创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各县设分会。长沙南学会每七天集会演讲一次，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主讲人有谭嗣同、皮锡瑞、黄遵宪等，他们在演讲中宣传世界形势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阐述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主张，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学会的推动下，湖南的维新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相继建立。为了适应维新运动发展的需要，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于1898年3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给南方各省以很大的影响。

在两广，康有为于1897年2月在澳门创办《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学生徐勤担任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报刊。同年春，康有为又去广西桂林讲学，发起组织“圣学会”，出版《广仁报》。两广的维新运动也活跃起来。